一朵清新的工運蘭花：古秀蘭女士訪問紀錄

張宗坤

臺灣勞動歷史與文化學會執行秘書

陳柏謙

臺灣勞動歷史與文化學會秘書長

摘要

古秀蘭女士，1962 年出生於新竹新埔，農村客家家庭出身。1977 年照門國中畢業後，隨即進入紡織業工作。1977 至 1980 年間，陸續於平鎮坤慶紡織、竹北台元紡織、八德聯明紡織從業，1980 年 6 月再進入遠東紡織新埔廠任職。1989 年 5 月捲入遠化罷工後不久，參與遠化工會的復原，後於 1993 年離職，轉任勞動黨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並投入 1993 年新竹縣縣議員選舉。1997 年離開勞服中心後，再至新竹縣仁愛之家服務。是次訪談請古秀蘭女士分享 70 年代末期至 80 年代間在紡織業的工作經驗，特別著重於女性在家庭與職場間的張力與平衡，以及家庭在罷工與工運參與中的作用。

關鍵字：勞工運動、社會運動、遠東化纖罷工事件

投稿日期 2021 年 3 月 2 日，送審日期 2021 年 3 月 24 日，通過刊登 2021 年 4 月 12 日。



圖 1　古秀蘭女士近照
資料來源：古女士提供

訪問：張宗坤、陳柏謙，紀錄：張宗坤

時間：（一）2020 年 2 月 24 日上午 10 時半至 12 時

（二）2020 年 7 月 9 日上午 10 時至 12 時

（三）2021 年 2 月 25 日上午 12 時至 12 時半

地點：新竹古宅（新竹新埔）

壹、走出農村

1962 年，我在新竹縣出生，我是土生土長住在客家農村的鄉下人。我們家以務農為主，但新埔這邊的田比較不肥沃，那時家裡只有幾分水田，大概距離新埔街上 6 公里左右。家裡的田主要都是爸爸他們兩兄弟在做，我會幫忙提點心去，比較沒有下田做過。爸爸跟媽媽光作田不足以養家活口，還要幫人家割稻、插秧或燒木炭，透過換工[1]來照顧家庭。因為我們家只有一點點田，別人只要一工、兩工就可以做完；我們去幫人家做，有時候可以做到三工、五工。

我們家有 7 個姐妹，沒有兄弟。上面 3 個姊姊，下面有 3 個妹妹，我剛好在中間。我大姐是 1953 年生，跟我差 9 歲。7 個姐妹裡面，除了最小的妹妹有唸到高中外，其他幾乎都是國中畢業之後就出社會，幫忙貼補家用。那時候我們只要可以上班賺錢，就會趕快去上班賺錢，想幫家裡減輕經濟跟生活的問題。

貳、台元紡織的工作經驗

在國中畢業以前，我有去過中壢山子頂的坤慶，[2]也是紡織廠。那間工廠本來說是要跟各地的學校做建教合作，我因為跟其他工人不熟、沒伴，而且還要離家居住，做不習慣，所以才兩、三個月而已我就走人了。

---

* 訪談者要特別感謝黃秋香女士的引介。本項訪談獲得文化部「推動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補助－戰後臺灣客家工人的勞動經驗與族群文化：以遠東化纖新埔廠為例」支持。

1 換工，指農業社會中農民彼此交換勞動力施作農務的過程，不同地區有「交工」、「放伴」、「幫工」等不同說法。請參考辛玉如，〈客家區域生產制度之研究——以東勢鎮換工制度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年）。

2 坤慶紡織，原稱坤慶蔴紡織廠，係由陳阿金、廖慶火家族投資成立，後於 1956 年由台南幫吳家接手經營，由吳尊賢任董事長、吳金台任總經理。初因吳家對蔴布料不熟悉，經營艱困，1960 年後改紡製壓克力紗，經營方好轉。工廠原址設於中壢，後增設平鎮廠。請參考謝國興訪問，蔡淑瑄、陳南之紀錄，《吳修齊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年），頁 232-234。

會知道台元是因為耳濡目染，知道鄰居跟親戚有很多人往那邊去。我是在國中畢業後，大概 16 歲時進去的。之所以會到台元紡織，第一是因為它有交通車直達我們家門口，每天通勤，方便又安全；然後我們家姊姊、鄰居跟嬸嬸她們都有在那邊上班，是她們帶著我介紹進去的。其實，台元是我考慮各方面後別無選擇的選擇，因為沒有新的資訊跟我說有別的工廠，或是別的可以工作的單位；也有些工廠是有工作機會，但沒有交通車，我也沒得去。

台元裡面分成棉廠跟絲廠，我跟著朋友的姊姊到絲廠工作。在絲廠工作的人很多，但是工作環境比較封閉，除了同班、同區塊，或是一起搭交通車的鄰居外，別班的人你都不認識。台元沒有聯誼活動，因為那時台元的男性比較少，多半是做機務類的工作，在現場產線上的都是女生比較多。不像後來聯明比較多外地人，又因為放假要放很多天才能回家，所以郊遊就比較多。

台元分三班輪班，我們先被分成甲、乙、丙三個班，每個禮拜輪班一次。[3] 早班是早上 6 點到下午 2 點，中班是下午 2 點到晚上 10 點，夜班是晚上 10 點到隔天 6 點。那時沒什麼休假，也沒有工作 40 小時或 48 小時的限制，如果有休假，那也是自己排或什麼的。事實上，我對休假完全沒印象，所以後來才會逃之夭夭。最可怕是在禮拜天轉班的時候，有兩個班要連上 12 個鐘頭。一班輪早上 6 點到晚上 6 點，另一班輪晚上 6 點到隔天 6 點，來取代另一個班。這個做法非常殘酷，我每天下班回家就是哭，實在太累太辛苦了。

那個時候不太需要加班，這種輪班方式人力就已經飽和了，而且因為交通車都是按班發車，加班的話就沒有車好搭。每天工作 8 小時裡，每一班的

3 關於台元的輪班制度，台元的創辦人之一吳舜文有另一種說法：
紡織業在臺灣發展的背景，和大陸自不相同。那時臺灣業者因業務來源穩定，並不重視品管，只一味追求產量。一般紡織廠的作業員一天分兩班，每班工作十小時，如須趕貨，往往要再加上兩小時班。然而人的體力有限，超時工作必然影響效率；吳舜文看到紡織工人把一天中一半的時間消耗在溫度高、噪音大、空氣雜的廠房裡，下決心要以縮短工時來改善他們的生活，同時提升工作效率。
實施三班制的立意雖美，推行過程中仍遭阻力。有些工人情願超時工作以賺取加班費。當時政府尚未制定勞基法，工時不受法令限制，吳舜文為徹底推動這個革命性的制度，在了解工人的心思後，豪氣干雲的宣告，往後工人不必加班，工資仍以加班應得合併發給。
工廠分三班工作，須多雇用三分之一的人員，利潤當然減少。但吳舜文認為，兩班制對健康造成的影響，實非金錢足以衡量。她大魄力的決定讓員工減少工作時間，而仍保有原來收入，員工遂欣然接受了新的制度。
請參考溫曼英，《吳舜文傳》（臺北：天下文化，1992 年），頁 211-226。

中場也只有給你兩個硬饅頭，分到我們手上只剩微熱，沒有什麼了。你自己要帶東西去吃的話，沒有辦法蒸飯，還沒時間吃。有的人甚至根本沒吃，就把饅頭帶回去，反正有吃跟沒吃一樣，不會覺得飽或有什麼感覺。

叁、聯明紡織的工作和休閒

我的三個姊姊中，一個在台元做習慣了，三姐則是有認識的朋友找她去桃園八德的聯明，說是那邊待遇比較好，上的班也比較輕鬆，不像台元那麼緊湊。我那時剛出社會，才 16 歲，可能因為吃不了苦吧，台元的工作又確實比較辛苦，一年多就離開台元了。相比之下，聯明的工作強度跟待遇都比較好，一進去的薪水也比台元更多，所以我跟姊姊才待得住。

聯明是有宿舍的，就在廠區裡面，我們女工都住宿。大家都是年輕的女孩，雖然可能分別來自臺東、雲林或是礁溪，但是下班後女孩子聊的話題都很單純。那一年多非常開心，住在外面，感覺很新鮮，大家來自四面八方，我認識很多新朋友。這些女工都是「母雞帶小雞」，就是被鄰居或是姊姊帶上來的。

我那時候都幫女同事做「槍手」，幫她們寫情書。因為我爸爸當鄰長，可以免費拿《中央日報》，我從小看到長大，都會看一些副刊的文學文章。我大概因此比別人成熟一點，可以多了解一些這樣那樣的事情。這些南部上來的女孩子，她們比較不善於表達。我幫他們寫，她們會謝謝我，我也高興，大家都開心。那個時候，鄉下有很多助割的阿兵哥，[4] 他們會跟女孩子互相

4 1950 年代起即存在國軍助割的紀錄：1952 年駐新竹空軍警衛部隊曾自行發起助割運動；怒潮部隊駐在新埔期間，亦曾自組助割小隊，協助過當地居民割稻。助割被認為是國軍「軍愛民、民敬軍」軍民一體精神的實踐。1970 年代，隨著助割的規模越來越大，國防部認為有管理助割的需要，遂於 1975 年訂頒「國軍支援農村經濟建設助民割稻實施規定」，針對助割計畫的擬定、參與助割的人員與執行的期日、助割對象的優先順序，以及助割人員領受餽贈的限制提出規定。請參考軍聞社：〈各地豐收忙 駐軍展開助割運動〉，《中央日報》（新竹，1952 年 7 月 10 日），版 4；軍聞社：〈國軍助民割稻 國防部頒實施規定 全年助割二期不受任何招待〉，《中央日報》（臺北，1975 年 4 月 20 日），版 1；李選民，〈怒潮澎湃三、怒潮師生助民割稻記〉，收錄於「李選民的海天瑣憶」：https://lsm14.webnode.tw/products/ 怒潮澎湃三、怒潮師生助民割稻記 /（2020 年 7 月 19 日點閱）。

留聯絡地址，情書寫好了之後，就寄到他們地址的郵政信箱去。除了阿兵哥外，其他也有寫給這些女孩子家鄉的同學或者同伴。包含我自己也有認識過一個對象，只是他住得太遠了，在屏東，所以就沒有再發展下去。

聯明生產的東西跟台元一樣，只是規模比較小一點，大家的親和力也比較強一些。廠區裡面有很多娛樂設施，乒乓球、撞球，或是福利社，讓我們下班後能夠聯誼跟休閒，這也比在台元更有生活品質。聯明每天都還有交通車可以載我們去桃園或中壢市區，我們會呼朋引伴一起去看電影、逛街。而且，在聯明的時候有機車郊遊，很開心！就是換鑰匙的那種。我們女工裡面有頭頭，會跟隔壁廠的男孩子接觸，招呼他們出幾部摩托車，我們這邊就幾個女生去。我沒有負責糾集，就是去參加。

聯明之所以比較輕鬆，不是因為排班的緣故，而是因為生產機器的差別：台元的負荷量非常大，工作量是飽和的：你走過來，那邊就空了；走回去，這邊就空了。聯明的紡紗轉盤轉得就沒那麼快，我一次可以掌握兩台機器還有空。我在聯明的班長是臺中清水人，他對我說「你足勇的喔！啊閣有閒幫人做別項喔（臺語）」[5]，他說我很行啦，我可以自己做，還可以幫別人。

到聯明之後就有特休了，我特休時都要回家，但還是沒有一般幾天休幾天的休假。除了休假之外，我們還有小 off，就是換班的小假。比如說今天早班從晚上 8 點上到隔天 4 點下班，換班的時候早班上班的人就跳過 4 點到 12 點的中班，隔到第二天的 12 點上夜班；中班的人上完後，隔到第二天的早班再上班，這樣就會有一段空檔可以利用。

機車郊遊的時候我們都是利用小 off，比較好召集，人也會比較多。至於私底下約會，就不用機車郊遊，都各自帶開。在聯明的時候我很單純，因為接觸面不廣，對不公平沒有太多的想法。離開聯明前，我的薪水應該有 8,000 多塊，每個月還固定拿 5,000 塊給媽媽。

5　訪談者按：本文所有閩南語漢字係參考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輸入。

肆、轉入遠東化纖，開始認識工會

在聯明這邊大概工作了一年多，我報名了遠東的面試，錄取之後就過去了。招募的訊息是口耳相傳聽到的，很多人想要進也進不了。我報名遠東時，爸爸有找人家幫忙，而且遠東又離家裡近，待遇跟風評好，我就毅然決然去工作。遠東雖然要求高中畢業，但我去報名，也還是錄取了。1980 年 6 月 13 日我到了遠化，我永遠記得，有一份錄取通知單，叫我們什麼時候去報到。[6]

我對遠化工廠的第一印象很不錯，建築物跟廠區都很大，就認為說福利待遇都比較好。事實上，實際進去之後也覺得不錯。剛進去的時候薪水大概 9,000 多，然後一直升升升，我到離開的時候，就已經領到實拿兩萬五千多，算是很不錯。進到遠化之後我分配到絲一，算是絲廠的後紡，負責靠機台測絲的穩定性。這個後紡的工作，已經跟我在台元、聯明的時候完全不同，比較輕鬆也比較好。

在遠化我都自己上下班，有時候我騎車，有時候我先生載。遠化跟聯明一樣，也有小 off，也會辦機車郊遊。我們科多半都會找隔壁科的來聯誼，因為我們科都是未婚的女生比較多，隔壁負責機台運轉生產的都是男生，他們又認識其他廠的，這樣一起去玩比較開心。我們最遠去到陽明山，往南走就是到八卦山。通常以一天為主，只有一次是前一天傍晚出門，我們在陽明山夜遊沒睡覺，玩到天亮，到第二天晚上上班前才慢慢逛著回來。當時的機車郊遊還造就好幾對佳偶，別班的也是。

遠化也有體育競賽的活動，我有打過排球。工廠裡面有籃球場、排球場，通常是廠內的單位互相組隊，在廠內互相競賽。在我離開之前是沒有游泳池

6 經查國史館勞工陣線聯盟全宗史料中之「1988 年遠化工會五一紀念品發放名冊」，古秀蘭係於 1980 年 4 月 15 日入廠，在成品絲一科服務。見「1988 年遠化工會五一紀念品發放名冊」（1989 年 5 月 1 日），〈遠東化纖罷工事件（一）〉，《勞工陣線聯盟檔案》，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22-040000-0002。

的，但是那時就有托兒所了，叫做遠東文山幼稚園，[7] 我的老大跟老二都是在這裡畢業的。托兒所是職工福利委員會經營的，我在罷工後還當過托兒所第一屆第一次的勞工董事，是由工會推派我當的。

直到 1980 年進到遠化以前，我從來沒有聽過工會。台元有沒有成立工會，我不清楚；我到聯明的那時候，大概 1978 年、1979 年左右，聯明沒有工會。我在遠東，就是很單純地上下班，完全不知道。其實我們都有繳工會會費，薪資單裡面都有扣，但是我們不知道說工會在做什麼事情，也完全不懂工會的內容跟運作。直到罷工那一次才知道，原來工會的幹部做了那麼多事情，平常就在保護跟捍衛工人，保護我們的權益。

從爭取加班費和年終獎金開始，我開始有一點想要認識工會。遠化前兩次罷工的時候，[8] 我想說怎麼有那麼好，平白無故多了好幾千塊。工會出面幫我們爭取不休假獎金跟加班費的追補，讓我視野有打開來，聽到有工會這一個單位的存在，那時候開始有一點點印象，也知道有羅美文這些人。但那個時候我都還在廠區裡面，沒有實質去附和工會的一些動作，也沒有做到什麼事情。我在絲一廠的時候，沒有人告訴我誰是工會的幹部，也沒有人知道誰是誰，我也沒有投過會員代表的投票。

伍、家庭支持下挺過罷工

我老公不多話，不善於表達，不是可以天馬行空講話那種的，是很單純的人。都是他義無反顧地支持我，我才會有勇氣可以走到最後。罷工時我們班是最後最後才進廠的，因為我們的堅持，所以我們的主管也不會刁難我，

7 文山幼稚園係於 1990 年創辦，源於遠東紡織新埔化纖廠員工透過福委會提出的提議。取名「文山」，是因為幼稚園位於新埔鎮文山里。園址是由員工宿舍餐廳改建而成，空間約有六千平方公尺。見徐有庠口述，王麗美執筆，《走過八十歲月：徐有庠回憶錄》（臺北：口述者自印，1994 年），頁 317-318。

8 指 1988 年 10 月 25 日、1989 年 2 月 10 日兩次由員工自主發起的野貓式罷工。關於這兩場罷工的經過請參考趙剛，〈工運與民主－對遠化工會組織過程的反思〉，《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4 期（1996 年 11 月），頁 1-39。

他知道我是講理的人。我之所以能夠平衡工作跟生活，最大的主因，還是要靠我先生。

在沒有人提供訊息的情況下，我個人對工會有很高的支持。我可能或多或少有接觸到一些文宣資料，上班的時候我跟同事互相聊天溝通，大家取得共識，要一致認同工會；回到家，我會把我在工廠裡面所接觸到的、發生的事情，或是工會在對會員做什麼工作跟我老公講，後來也把工廠外面接觸到的事情帶回去跟他分享，他支持我，他認同我，一路這樣子相挺過來。家裡由他跟老人家溝通，也由他掌管大部分孩子的照顧責任。我有時候到高雄、到臺北，後來上去臺北助選幾個月，都沒住家裡而是住在那邊。

我先生那邊也是客家人，他叫做陳進興，跟以前的新竹縣縣長同名同姓。[9] 他是我照門國中的同班同學，這間學校離我家蠻近的。他在三年級的時候轉到別班去了，重新碰面以前，我們中間隔了很多年沒有往來。他上下學要經過我家門口，所以他很清楚我就住在那邊。我娘家是照門里的中心點，大家坐車上下課，都會經過我家門口，所以我上下幾屆的國中同學我也都認識。我跟我先生是在民國 1983 年碰面的，那時我 21 歲。某一天，我跟我們家鄰居的姊姊一起下班回家，我們共乘一部車要往回家的路上走，他跟另外一個同學共乘另一部車要往新埔走，剛好在我們家跟街上之間的路不期而遇。

我們從開始交往到結婚隔了 2 年。他出路不錯，當兵時抽到海軍陸戰隊，要服役 3 年，乾脆就去報考了警察學校，做了 4 年的限期替代役，後來就當警察去了。他在三重分局中興橋派出所的交通隊當交通警察，從我們不期而遇那一次他開始追求我。追得很熱烈的時候，比如說他早上 7 點到 9 點有一個班，晚上 5 點到 7 點有另一個交通指揮的班，中間都是備勤，他可以晚上 7 點下班後，從臺北三重趕回來陪我約會，到第二天 5 點多出門，去臺北趕

9 陳進興為第九、十屆新竹縣縣長，任期為 1981 年 12 月 20 日至 1989 年 12 月 20 日。另據古秀蘭女士 2021 年 2 月 24 日來訊補充，「當時到縣政府爭取合法性罷工解釋，時任縣長就是陳進興縣長，好不尷尬。」

7 點的班。那時候交通工具不很方便，我覺得他很猛。我們這樣子持續到結婚，大概有一年半的時間。

婚後前半年，我老公都還在臺北。後來是我娘家爸爸說他是獨生子，早晚要回來陪伴跟照顧老人家，所以要他不要繼續當警察。我婆家在新埔快要靠近楊梅的邊邊的山上，還有兩甲地的橘子園。他們家完全是在務農，但並不是很封建的家庭，像平安戲跟春節拜拜的東西，都是我婆婆準備的，到目前為止都是。我婆婆算還不錯，這些部分她都會處理好，我頂多拜完回來準備用餐的工作。

到我老公要離開臺北，那時是羅張當警政署長，[10] 治安很不好。還好他考上警政的丙等特考，有公務人員的任用資格，我娘家爸爸就要他回來鎮公所工作，這樣子可以照顧到家庭又兼顧工作。丙等特考考上後，必須自己找職缺，那個時候還可以從警察轉任別的，過了幾年後好像就不可以了，所以他算是運氣好。

回到鄉下後的半年，他沒有找到能夠填補的公務人員職缺。中間他還到大魯閣紡織當了 3 年的警衛，必須輪班。很巧的是，他輪班的時候，我剛好變成正常班，我就可以照顧孩子。後來他在 1988 年轉到新埔鎮公所去了。他很支持我參與這場罷工，那時我們跟警察有衝突，他就說：「你們守罷工線，推鐵門的時候，妳退出來，換我進去。」他幫我推。是因為他的支持，我才有勇氣可以繼續走下去。

公司後來有打電話到各個會員的家裡面做親情遊說，叫家裡人勸我們回去正常上班。我們家也有接到，但是是老人家接到的，他聽不懂，所以沒有受到這方面的壓力。其他單位的同事有說過，他們的長輩會講：「罷什麼工，

10 羅張（1923-2006），江西新建人，歷任海軍陸戰隊司令、警總副總司令等職，1984 年 7 月以軍職外調，轉任警政署第四任署長，任內督導各縣市警察局編成霹靂小組、規劃執行一清專案並執行檢肅流氓條例，並經歷解嚴造成的重大警務變革，負責處理五二〇事件等重大社會運動，1990 年 8 月卸任。請參考內政部警政署，《警政首長專刊》，收錄於「內政部警政署警察史蹟館專區」：https://www.npa.gov.tw/NPAGip/wSite/historical/web1/index.html（2020 年 7 月 18 日點閱）。

趕快回去上班，沒做沒飯吃。」我們家的狀況是不一樣的。婆家這邊因為住得比較偏遠，他們跟外界的訊息比較沒有密切聯繫，完全都由我老公在支持我，他們家的部分由他做聯繫，讓我在外面有空間。

從罷工以後，到投入勞工服務中心、選舉，再到離開勞服中心以後的生涯，如果沒有他的支持，基本上我是一步都走不出來的，就得臣服於公公婆婆、礙於照顧孩子，又是一位職業婦女，這個角度很不好使。我在罷工時完全沒有擔心說什麼工作不保，或是擔心會遭受什麼對待。我姊姊一樣在那邊工作，但是她就沒有我這樣。一方面我姐夫的支持度可能沒有那麼大，她回去可能也沒講，也沒有我那麼有這樣子的想法。她還是支持我們的，只是說沒辦法每件事情她都參加。我因此覺得：在比較長時間的抗爭中，家裡的支持是最重要的。

陸、從高峰到收場的罷工回憶

不是我自誇，1989 年 5 月遠化罷工時我在廠裡面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我平常做人做事都很 ok、很成功，所以我一聲令下、招呼起來，班上的大家都會認同我們。從徐正焜[11]的調職案開始，在廠裡面我們口耳相傳跟相互討論，大家就一起參與，在行動上跟精神上，我們都是支持工會所做的一切。

公司一定有想辦法要大家不去投罷工投票，但因為我們的意志力很強，向心力也很夠，所以不為所動。我們的向心力全部是自動自發的，一點都沒

11 徐正焜，1948 年出生於新竹竹東，家中經營雜貨店。1967 年考入中興法商學院企業管理系，1974 年退伍後於維霸順公司擔任銷售人員，後因公司發生財務危機，率工人前往花旗銀行討回餘款。1977 年以大學學歷考入亞東化纖（遠東紡織新埔廠前身），任倉儲科管理師，期間調任板橋並轉入會計部門，1986 年返回新埔廠後開始積極參與工會事務。1989 年 4 月公司欲再度調派其赴板橋任職，同年 5 月因拒不到職而遭解僱，此一事件成為臺灣解嚴後第一波自主工運最重大工潮的導火線。

有被脅迫跟要脅。那個時候會有那麼多團結面出來，就是平常這樣累積起來產生的。

罷工最激烈時我感到很生氣。我們既然都已經有申請合法罷工，為什麼要遭受這樣子的對待？那時候看到警察人員一批一批地進廠，我質疑為什麼國家機器可以由遠東化纖指揮，那個時候就有一種很不公不義不公平的感覺，真的很生氣。我們手無寸鐵地守在那邊，沒有要破壞，也沒有要做什麼，為什麼要對我們這樣？

推鐵門那天，我就在鐵門外面拉著布條，守在罷工線，我們一直在精神喊話。當天的氣氛是一天一天一直累積起來的，推鐵門那一次就已經是到達了最高點了，我們女生都還是坐在第一線，羅主席他們在前面演講。我有一個同事叫蔡瑞鳳，她哥哥跟我老公一樣，是新埔鎮公所的同事，他們都一起來參與支持罷工。我老公就講，「妳坐在那邊，等推鐵門的時候妳們會危險，妳就退後換我們男生衝上去。」

罷工拖了蠻長一段時間，我非常煎熬，對孩子很不好意思。我的小孩子一個 1985 年出生、一個 1987 年出生，一個未滿 3 歲、一個未滿 5 歲。除了我老公上班偷溜出來照顧外，多半是給我公公婆婆照顧。公公婆婆不知道罷工的事情，我完全沒有跟他們說。我雖然有被媒體拍到過，不過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第四台，所以我們是看不到的，沒有那麼發達的其他一些媒體報導。

廠內有資方的、投機的，只打算佔便宜不付出，不支持工會的那些人；在廠外就是我們這些堅持的人，罷工的時候分成了這兩個不一樣的部分。地方上的人對罷工也是兩極化，有些人聽到資方說的話，就覺得好像是我們不對；他聽到我們講的話，又覺得工廠應該要釋出善意，跟我們共存共榮。總的來說，我們新埔鎮所有在地的居民，則是認為罷工是一個很大的盛事，不曾遇見過，大家都在看熱鬧。

罷工之後，工會受傷很重。我們一切都是按照合法的程序走，是合法的罷工，被公司舉告說是非法，我們也是很糾結：我們必須要面對我們的家人跟朋友的詢問跟關心，又必須要面對我們自己這些留在工會裡面的這些人。到目前為止我都不認為那場罷工是錯的，在我心裡面，我永遠都認為是對的。因為我們有按照罷工的程序走，只是政府跟資方結合，打壓工會，不讓我們冒出頭，所以把合理的罷工說成是非法。

柒、收拾殘局到離開遠東

因為罷工，廠裡面的大家很擔心會被秋後算賬，我是先教育了我們班的同事。罷工後因為我是我們科 C 班的班長，主管們對我很頭痛，我就說，「沒關係，有責任我擔當，有什麼事情衝著我來。」所以那時候我們班最快樂，大家都相處得很好。我希望讓同事知道，我還活得好好的，不會受到任何的處分跟各方面的差別對待，他們就會支持我，也支持工會。至於其他保持觀望的人，我們用連鎖效應去感化他們，很多人看在眼裡，就會認同我們、支持我們。

工會的重要幹部後來都被公司開除了，我們大家有志一同，一定要挺過去。我後來也投入工會選舉，當上了監事，第一次參選就是罷工之後那一屆。我們很多一起參與罷工的同事，好幾個都參選。我們一方面也是在學習怎麼樣捍衛工會的職權，一方面也要讓大家對工會有向心力，讓大家知道工會是真要為大家爭權益爭福祉的。

罷工之後，我加入了勞動黨，算是蠻早的。罷工那時候我們在小木屋餐廳有聚會，外面來協助的有一些是工運人士，還有包括勞動黨的部分，再加上羅美文在當主席，所以我就很真誠地參與到現在。其實我先生也是勞動黨黨員，他是跟我一起加入的。我是在 1993 年 8 月 20 日離開遠東的。我離

開是因為羅主席說勞動黨勞服中心的辦公室缺一個工作人員，意思是我可以去。他可能看我不錯，就問我答不答應。他跟我說：「妳在遠化多少錢，辦公室就給妳多少錢的薪水。」那時候本來想說要走，可是心裡又慌慌的，到底我能不能勝任，畢竟我又書讀得不多。

後來我想一定要走的時候，我們遠東的副總廠長把我找到辦公室談了三次。在這位副總管理下的重二有很多單位，包含絲廠、假撚、重合等等很多的單位。前面兩次他找我跟某個主管，後來這個主管被換成另一個很不 ok 的，很會刁難我們同事，我就拿他來做箭靶。這位主管寫了三大張十行字的投訴書交給曾副總，曾副總把我找去他的辦公室談，他說，「古小姐，我覺得妳不錯，妳的思維跟各方面談吐，不會像是某主管講的這樣子。」

副總一直想要留下我，他說只要我留下來，不要離開，「所有重合廠的單位，妳想要去哪裡都可以。」最後第三次，他才說，「古小姐妳這樣子離開，妳會很吃虧。」因為罷工之後，遠化叫我們離開，是有一筆優退的，我這時候離開等於是自願離開。但這個部分我就不再去想，不再去計較才離開。離開的時候，我沒有跟副總說我要去勞服中心服務。

捌、勞工服務中心的見聞與學習

從 1993 年到 1998 年，我在勞服中心待了 5 年多。我是勞服中心的總幹事，剛開始完全不知道工作內容，就義無反顧地投入工作。我也很大膽，知道自己的學歷也不高，但要去投入那邊，必須要懂得很多，包含工會法、人民團體的一些相關知識。很多知識都是因為在羅主席身旁，耳濡目染學到的。那時候桃竹苗的工會我都走透透，只要羅主席的腳步到哪裡，我就開車跟到哪裡。

勞服中心屬於勞動黨的第二黨部，[12] 所以要雙頭進行勞工服務，結合黨部的組織工作，很多東西都是很新鮮的。我接觸了之後，一邊學習一邊成長，才知道一些例行性的工作，也能夠隨時處理突發狀況。我們的組織工作有一些是例行性的，包括一個月要開一次黨委會，我們還得大門開開，接受因為羅主席參選的兩場選舉，所產生的民眾服務跟關懷，以及勞工各方面服務的增加。所謂突發狀況，多半是民眾來請求協助，像是發生車禍等等。

勞服中心還必須跟工會幹部聯繫感情，所以我們發展出在辦公室煮菜的做法。最多的時候可以辦 3 張桌子，都是我自己煮。另外很多遠東的同事，只要我們要去臺北抗爭，在他們允許的範圍內都會支持。不過，我們新埔因為是農業跟工業社會的結合，有些同事還是會有一些牽絆，也有些人雖然心裡支持我們，但走不出來。另外，我雖然有碰到比較有勞動意識的工人，但多半很現實。每個人的條件不會都跟羅主席或跟我一樣，大家都為家庭、經濟、生活所牽絆。勞工能夠真正這樣走到底，發展得比較好的，好像就只有陳新源。[13]

勞工服務裡，還有像是處理退休金、基本工資跟加班的糾紛，我必須要幫忙做勞資爭議調解。我在調解時遇過現在的勞工處處長，那時候他還是科員。我印象比較深刻的調解，是在東大路四段那裡，做翻砂的三個老人家拿不到退休金，我去擔任調解委員，幫他們調處。翻砂要處理燒得很紅的鑄鐵，很辛苦，三個老人家裡有一對兄弟都住在湖口，另一位住在新埔。調解到後來，我們大家後面都變成好朋友了，我們互相關心，我都還記得他們的名字。他們非常滿意調解的成果，因為在他們想像不到的狀況之下，居然還有這一筆退休金可以給他們用來養老。

12 勞工服務中心由遠化工會的幹部於 1986 年成立，1988 年由新埔搬遷至新竹市東大路，1989 年後由勞動黨黨部主持，1991 年後遷至竹北市三民路。請見勞動黨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勞服中心介紹〉，收錄於「勞動黨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https://sites.google.com/site/workersthebig/home/labour（2021 年 2 月 23 日點閱）。

13 陳新源，曾服務於新竹嬌生公司，為該公司工會理事，現為新竹縣議會議員。

另外我也處理過長榮重工的關廠。當時羅主席希望他們組工會，因為長榮他們底下的單位都沒有工會，用組工會的方式，去幫他們要求平均工資的計算跟追討加班費。結果，新竹廠工人以他們的一個年資可以拿到十萬塊。我們處理完沒有多久，第二場就發生在長榮重工的中壢廠，[14] 他們接觸到了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那一邊，下場就跟新竹廠完全不一樣。我認為工委會太自我了，我們的態度是任何人要去幫助勞工朋友，我們都歡迎。但他們是閉門造車，完全切斷中壢廠工會主要的幾個發起人跟幹部跟我們的接洽。等到知道事情快要發生，我們也只能搖頭，就算想聯繫、想幫忙，我們也進不去。

玖、親身投入選戰

二區黨部開黨部委員會的時候，我那時初生之犢不怕虎，就出來選縣議員了。也不會想說自己沒有學歷去跟人家爭什麼，[15] 沒有錢、沒有財，就去跟人家選那一場選戰。我們對抗的是一頭大金牛，他當過兩任鎮長，也當過鎮民代表會的主席，[16] 就我跟他的岳母爭只有一席的婦女保障名額，沒有當選是我們想像得到的。從遠東出來，不到半年的時間就打了選戰，我第一次出來選，就拿了 1,100 多票，算是很不錯。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競選活動是公辦政見會。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只有張俊傑幫我列的幾個提示重點，讓我能夠去發揮。我拎著高跟鞋進去會場的

14 長榮重工中壢廠於 1994 年 5 月 7 日組成「桃園縣長榮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壢一、二產業工會」。同年 8 月、10 月，長榮解僱近 70 位的工會幹部和會員，並懲戒 50 多名參與工會的員工，截至年底，工會人數剩下不到十人，只能黯然宣布解散。見徐國淦：〈64 名被解雇、降職員工獲發資遣費 工會被迫解散 長榮重工勞資爭議 達成協調〉，《聯合報》（桃園，1994 年 10 月 29 日），版 17。

15 據古秀蘭女士提供的競選文宣「古秀蘭檔案」一節所言，其學經歷如下：
世居新埔・照門國中畢業・32 歲・台元紡織廠・聯明紡織廠・遠東化纖廠・曾任：遠化工會監事・遠化職工福利委員會附設文山幼稚園董事・現任：勞動黨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總幹事。

16 訪談者按：根據古秀蘭女士 2021 年 2 月 24 日來訊補充，「當時參選縣議員對手是曾經擔任過關西鎮代表會主席跟兩任的鎮長之人，爭取婦女保障名額，當時新埔關西為同一選區。」

時候，原本是想看看前面第一、第二個人怎麼講，多少有一點可以學習。等我一抽籤，就抽到一號。我想，「好，那就卯足全力上了。」結果我發表的 15 分鐘裡，完全沒有冷場、沒有間歇，把時間用到淋漓盡致。那時候我們偷偷地把傑哥（按：張俊傑）準備的宣傳車停在新埔國小的校門口，我帶了一支無線麥克風進去，跟車上的麥克風同步發聲，等於街上的大家都聽得到我在裡面的政見發表。

我最灰心的時候，是羅主席跑來我的辦公室說「古秀蘭怎麼會有票？」原來他去湖口的辦公室，了解了當時的買票文化。比如你家裡面有五張票，爸媽、兒子、媳婦跟女兒，買票的時候要買哪一張？要買媳婦的，因為媳婦是外來人。一個家裡可能爸爸是陳姓的、媽媽是羅姓的，這些配票都已經配好了，買票的時候就是要買媳婦的。聽到羅主席講這個話，我覺得非常震撼。他回來跟我們問：「我們的票在哪裡？」他才知道我們選得很辛苦。那我想：還要玩嗎？還要選嗎？可是已經要選了，既然決定了就是做，不然怎麼辦？

在我競選縣議員期間，因為新埔跟關西是同一個選區，範圍很廣，我必須到處拜票。我兒子那時在讀新星國小二年級，每次下課就是去鎮公所找他爸爸，結果他居然走反了，一路向文山幼稚園的方向走。因為我在選舉很忙，後來是我遠東的同事在新埔大橋那邊發現我兒子，就把他接回中正路上我的競選總部。他回來的時候，我聽了心酸得很，萬一我這個孩子不見了，或是被人家帶走了，怎麼辦？那會是我一輩子的痛。

我因為參選得到了肯定。選舉一開始，我不知道怕，是我娘家爸爸怕我選後會受傷，後來看我們這麼認真地一步一步走，他也站出來挺我們。選舉時大家捐錢、捐香菸又捐物資，選舉後我們夫妻還人情還了五年，都沒有讓勞服中心負擔。這場選舉下來，讓我婆家跟娘家的所有親戚、我們的鄰居都對我另眼相看。雖然我沒有選上，但也有增添他們的光彩。

拾、家庭美滿帶來的榮譽感

1998 年離開勞服中心時，我有一年的空檔純粹在放空，完全沒上班。那一年沒上班，讓我思考該怎麼走下一步，是要繼續工作？還是就是這樣子下去？因緣際會，新竹縣產業總工會在仁愛之家設立辦公室，我偶爾會去串門子，認識了當時仁愛之家的戴主任。他看我每天都拎著包包來，就要我去他那邊上班，我想也不錯，反正閒著也是閒著。他就幫我簽了案，到仁愛之家擔任臨時人員，直到現在。仁愛之家在 2003 年撤掉了，我就回到新竹縣政府工作。

在我兒子結婚的喜宴上，我們辦了 70 桌。我先生一直問說，你要辦那麼多桌，哪來那麼多人？我說，「我有，你放心。」我從罷工出來，到勞服中心、到選舉，再到地方上的經營，這都是我個人的人脈。他又說，現在請客都會虧錢，我就說，「沒有關係，兒子這場婚宴是我主張要請這麼多人，我要跟大家分享歡樂，即使虧錢我也高興。」結果這場婚宴光是收的禮金，還超過辦婚禮的花費好幾十萬，讓我受到家族跟所有親朋好友的肯定。除了高興之外，也是讓大家了解我們夫妻的為人處世，著實也讓所有人看到了我們平常的認真努力，以及在地方上的人和。

我對罷工或是參與工運，真的不會感到後悔，因為我的視野放寬了，成長了也進步了。看到各方面的人事物，也認識勞動黨的老前輩。前輩們投入社會運動，為改造不公不義的社會做了那麼多的努力，我們只是跟著他們的腳步在走，傳承他們的精神，我永不後悔。

參考書目

壹、檔案

《勞工陣線聯盟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遠東化纖罷工事件（一）〉，典藏 122-040000-0002。

貳、專書

徐有庠口述，王麗美執筆，《走過八十歲月：徐有庠回憶錄》。臺北：口述者自印，1994 年。

溫曼英，《吳舜文傳》。臺北：天下文化，1992 年。

謝國興訪問，蔡淑瑄、陳南之紀錄，《吳修齊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年。

叁、學位及期刊論文

辛玉如，〈客家區域生產制度之研究 —— 以東勢鎮換工制度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趙剛，〈工運與民主－對遠化工會組織過程的反思〉，《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4 期（臺北：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社，1996 年 11 月），頁 1-39。

肆、報紙

《中央日報》，1952、1975 年。

《聯合報》，1994 年。

伍、網路資料

內政部警政署，《警政首長專刊》，收錄於「內政部警政署警察史蹟館專區」：https://www.npa.gov.tw/NPAGip/wSite/historical/web1/index.html（2020年7月18日點閱）。

李選民，〈怒潮澎湃三、怒潮師生助民割稻記〉，收錄於「李選民的海天瑣憶」：https://lsm14.webnode.tw/products/ 怒潮澎湃三、怒潮師生助民割稻記 /（2020年7月19日點閱）。

勞動黨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勞服中心介紹〉，收錄於「勞動黨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https://sites.google.com/site/workersthebig/home/labour（2021年2月23日點閱）。

臺灣文獻 73 卷第 2 期

A Refreshing Orchid of Labor Movement — Interviews with Xiu-Lan Gu

Zackary Zong-Kun Chang *　Po-Chien Chen **

Abstract

Xiu-Lan Gu, born in Shin-chu Shin-pu on 1962, came from a Hakka Rural Family. Mrs. Gu joined in textile industry immediately after she graduated from Jhao-men Junior High School. During 1977 to 1980, Mrs. Gu worked at Kun Ching Textile (Ping-zhen), Tai Yuen Textile (Chu-pei) and Lien Ming Textile (Ba-de) one after the other, then she went to Far-East Textile Shin-pu Factory (as known as Far-East Chemical Fiber or FET) in June, 1980. Mrs. Gu assisted the recovery of the Far-East Chemical Fiber Union after she involved in Far-East Chemical Fiber Strike in May, 1989. Mrs. Gu resigned from FET in 1993 and started to take part in Labor Party Tao-Chu-Miao Labor Service Center. In the same year, she also plunge in 1993 Shin-chu Local Councillor Election. Mrs. Gu Leave the Center in 1997, and served for Ren-ai Senior Citizens' Home. These Interviews with Mrs. Gu were focus on her working experience in textile industry during late 1970s to 1980. We are especially concerned with tension and balance of women between family and working place, and the affects of family on strike and labor movement participation.

Keywords：Labor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Far-East Chemical Fiber Strike

* Executive Secretary, TLHCS.

** Secretary-General, TLHCS.